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八二五期 ——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1111d)

---

|        |                   |     |
|--------|-------------------|-----|
| 【痛定思痛】 | 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      | 萧 象 |
| 【学术争鸣】 | 文革——一个还是两个，这是一个问题 | 刘 仰 |
| 【它山之石】 | 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 金宰贤 |
| 【劫后反思】 | 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 刘泽华 |
| 【往事非烟】 | 徘徊在生死之间           | 叶志江 |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痛定思痛】

陆定一文革遭遇的历史教训

• 萧 象 •

中央高层文革蒙难的幸存者中，陆定一可谓蒙冤时间最长、受难程度最烈者。从1966年5月文革伊始被打倒至1978年12月获得平反与自由，前后长达十三个年头。在此期间，陆定一经历了个体命运跌宕起伏的荣辱丕变，受尽关押监禁、刑讯拷打之苦，饱尝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之痛。这段炼狱般的悲惨遭遇堪称一段血泪交加的个人痛史，也是国家十年浩劫的一个缩影，给世人留下的除了沉重记忆的不堪回首，更有永记难忘的历史教训。

1965年底至1966年初的中南海，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尚昆被调离北京，罗瑞卿遭受整肃，彭真受到批判，这一连串事件显示毛泽东在为文革发动做好了最后的准备。1966年5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通过标志性的《五一六通知》，文革战火正式点燃。就是在是次会上陆定一与前述三者捆绑一起，被指控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分子而撤销职务，黯然下台。

关于陆定一文革中箭落马或者说被打倒的原因，1988年10月陆定一在回答项南这一

提问时说道：“就是为了我老婆写信揭发叶群。这同毛泽东没有关系，但他听林彪的。”陆定一自认为被林彪打倒的这种说法，一直以来代表了有关文革历史的主流观点，成为一般文革叙述的典型表达。

然而，在文革研究得益于互联网的神奇功能而越来越广泛深入的今天，这一说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对文革历史稍做涉猎，就不难发现，陆定一所以被打倒，其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一案的因素，也就是林彪可能施予的影响的确不可忽视，但至为关键的却是毛泽东为打倒刘少奇、发动文革的战略意图在发挥主宰的作用。众所周知，姚文元衔命所撰《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投石问路的一种试探，而此文1965年22月在上海发表后在北京的冷遇，中宣部所表现出来的有意无意的冷漠，意味着毛泽东倒刘战略意图在中央贯彻的受阻，使得毛泽东对陆定一及其中宣部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在毛看来，陆定一成了前进路上非移去不可的绊脚石。于是1966年3月中旬在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对中宣部明确提出警告，不要成为农村工作部（农村工作部1962年因犯错误而被撤销），3月下旬毛进一步发表讲话，宣布中宣部是“阎王殿”，号召“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其后遂有“阎王”中宣部长陆定一的被解职打倒。

如果仅从权力管理与人事变更这一微观层面而言，陆定一的被解除职务似并无不当。在民主社会，最高权力一旦确定，其他所有权力均由此而逐级派生，按照权力只对权力来源负责这一定律，派生出的权力所面对的，也就是所要负责的是上级权力。因此，当最高权力发现不能如臂使指唤遣调度下级权力之时，及时果断地撤销或收回下级的权力，毋宁是正当的明智之举。倘若事情仅止于此（陆被解职），问题自然也算不上如何严重，充其量不过一次人事变更的“茶杯风波”。因为任何时代都有朝廷命官因事获咎，这些获咎的官员或贬放地方，或降职使用，或归赋田园。这是政坛司空见惯的一种常态，也是古今贯通的政治传统，与百姓生计无关大旨，与社会运转无大影响。

可是，事情的发展却大大逸出人们可能的料想。由于毛泽东超乎常人想象的宏观战略，由于这宏观战略的指导思想，政坛常态被打破，政治传统遭抛弃，一次有可能正常的权力更替演变为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动荡与民族浩劫；作为整个历史场景组成的一幕，涉及陆定一的此次人事变更，“茶杯风波”发展成了令人闻之色变的惊涛骇浪。问题也就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陆定一始则被软禁，戴高帽、挂黑牌、受批斗；继而被隔离审查，遭刑讯逼供，严刑拷打：“审讯人员一拥而上，紧手铐的紧手铐，揪耳朵的揪耳朵，陆常被搞得不断失声惨叫，闻者心寒”，“每次审讯都把陆搞得脸肿、耳肿、手肿和流血”，由于铐得过紧，“致使手铐扣进肉内，造成手腕溃烂化脓”。（韩宗平：“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最后，陆定一于1968年4月未经审判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因写申诉，惹恼专案组，“被第二次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的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陈清泉：《在中央高层五十年——陆定一传奇人生》页291）

这就远远超出人事变更的可能范畴，而成为地地道道的人身迫害了。在前引文章和书中，林彪、康生、陈伯达等是作为陆案的决策和指使者而出现的，这让人们把愤怒与谴责的目光聚焦在了这些声名已裂的人物身上。的确，在陆案形成与审查过程中，林彪在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称陆定一“政变”，并发出“我今天要是带手枪来，一枪崩死你”的威胁，康生也以“陆定一是特务”进行过诬陷；陈伯达则接管此案时做出了“降低生活标准（不超过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撤掉。”这样十分不近人情的批示。他们的言行对陆定一后来的遭遇无疑施予了很大的影响。

但我们若就此遽然得出“坏人迫害”的结论，又未免仓促，既偏狭且肤浅。据邱会作回忆，在同一次会上，周恩来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对陆定一，不仅批评、痛骂，还激动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陆定一坐的那边去了。总理这样发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邱会作回忆录》页439）而“陆定一冤案十三年纪实”也提到“中央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对陆案做过三次指示，一次是1966年7月：“陆定一在苏联，据说苏修给他一万卢布。将来，可能搞他个里通外国。”一次是1976年2月：陆定一“要答辩，你们可以批他。他要求出狱，现在暂不理”。最后一次是1978年10月18日：“陆定一，毛主席指示放了算了，但他不出来。说不给他结论不出来，坐牢要把牢底坐穿。他把牢底坐穿了，地球下面就到了美国了。”按照现行政治规则，这位被隐其名的“中央有影响的人物”一定是受到尊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不特此也。1975年11月2日中央以“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为罪名开除了陆定一党籍。此时林彪、陈伯达早已倒台，文革已是强弩之末，虽四人帮结盟在朝，但邓小平业已复出，与周恩来、叶剑英等各手握重权，主持朝政。在许多老干获得了解放之际，中央反而对陆定一做出更为严厉的处置（此时周恩来重病住院，据《周恩来年谱》，同日邓小平前往医院探望，具体内容未载，可以推测与此决定不无关系）。

以往人们论及陆定一案，多以1966年5月会议决定为焦点，而避而不谈1975年11月会议决定。其实，某种意义上，1975年的决定更能反映陆定一遭遇的实质。如果说1966年5月的会议决定由于文革初期的乱云飞渡与严慰冰案匿名信的案发，多少受到某种气氛与情绪的影响，那么，1975年11月会议，没有了这些因素影响，仍做出这一决定，而这一决定实质是判处陆定一政治的极刑，这对青年时代就献身革命并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的陆定一，有如忠孝之子被冷酷无情地逐出家门，所带来的打击与伤害，比较先前的打倒和刑讯逼供的皮肉之苦，更为严重。陆定一宁肯坐牢也拒不接受这一决定的悲愤反应，足以见出打击之大，伤害之深。

一直以来，人们对发生在文革中某一政治行为进行评判时，往往以政治行为者后来的政治结局来反证当年的政治行为，以此来说明当年政治行为的邪恶是行为者本身邪恶所致。这种带有明显功利性的道德评判方法在陆定一案面前露出了马脚。陆案显示，不仅是林彪、康生、陈伯达，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周邓是两次会议的常委，叶是后一次会议的常委）也都是陆案的决策者，加入了对陆定一的“天下围攻”。例如，林彪对陆有过恶语相胁的愤恨，周恩来也有过砸缸掷陆的恼怒；陈伯达做过“降低生活标准”的批示，“中央有影响的人物”也下过“搞他个里通外国”的指示。二者之间看不出有何本质的区别。依此，我们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判断：一种政治行为所以如此发生，主要是决定于政治行为者的政治角色而不是个人品格。这一判断使我们进而肯定地说，陆定一案亦即陆定一文革遭遇是为中央高层集体行为所决定，而不是某某个别人物所造成。这就不仅动摇了“坏人迫害”似是而非的说法，提供了文革观察新的视角，也让我们从“奸佞乱朝”的迷惑与纠缠中抽出身来，把追根究底的目光投向“天下围攻”的行为本身。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对陆定一“天下围攻”这一现象，发生使陆定一打倒之后陷入更悲惨境地这种行为呢？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依据列宁这一经典说法，理论指导行动，正确的理论指导正确的行动，错误的理论导致错误的行动。之所以发生“天下围攻”的现象与行为错误，是因为作用于这一行为的指导思想——阶级斗争的理论错误。

众所周知，中共以阶级斗争为立党学说。阶级斗争强调区分敌我，鼓动阶级对立，突出事

物的矛盾面，宣扬人的阶级性。在生产力十分落后、人们的认识水平相当低下的时代与环境中，它激发人的阶级意识，唤起人的仇恨力量和造反精神，具有不可比拟的强大功能，因此，它成为中共进行武装斗争发动群众的一件法宝和用以克敌制胜夺取政权的一大利器。然而，一定的理论学说都有一定范围的适用性，都离不开时代与环境的制约性。武装斗争与和平建设，是两种不同时代与环境下的社会实践，武装斗争依靠阶级仇恨冲锋陷阵，和平建设需要人间和谐维持稳定共建家园，不同的社会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转换与观照。这是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也是时空转换带动事物利弊转换的辩证关系。

可是最讲辩证法的毛泽东偏在此处醉眼朦胧，陶醉于武装斗争巨大胜利带来的无边自信中，不识了战争与和平的时空转换可能带来阶级斗争利弊转换的“庐山真面目”，却因了天生好斗的个性，对阶级斗争青眼有加，建国后依然奉为法宝，作为国家建设的治国纲领；进入1960年代，在党内激烈矛盾和国际复杂局势双重刺激下，过度反应，自以为是，更把阶级斗争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要求全党全国“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社会确分阶级并发生斗争，人间自有矛盾并存在冲突，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证明，阶级斗争可以通过调和得到化解，人间矛盾能够自我平衡消融。作为夺取了政权的执政者，治政的主要方针应是通过安抚各方，发展生产，依靠法治，维护稳定，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不是继续强调对立，灌输仇恨，将阶级斗争进行到底。很不幸，毛泽东不谙此道，且反其而行之，于是，阶级斗争这柄革命年代克敌制胜的莫邪宝剑，在和平时期就变成了红楼梦中的风月宝鉴，所照之处，莫不“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等等牛鬼蛇神。而由于阶级斗争的长期宣传灌输和耳濡目染，属下治下如同喝了狼奶，无不绷紧了阶级斗争这根弦，以阶级划线，以斗争为纲，变得仇恨满怀，冷酷无情；一旦运动来临，号召发出，面对揪出打倒的牛鬼蛇神，更是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一泄满腔怒火而后快。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涉世不深的红卫兵还是忠于职守的专案员对陆定一是那样的心狠手辣，铁石心肠。与其说他们是在对陆定一进行非人折磨，毋宁说是在革命义愤驱使下对“黑帮”、“反党”分子施予阶级惩罚（文革曾任江青秘书的阎长贵在《问史求信集》中反思道，其当年撰文“在对历史学家翦伯赞的批判中，深文周纳、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感到“‘理直气壮’、坦然为之。”可为佐证），并以此为表示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伟大领袖的捍卫效忠。

也就是为什么中央高层对陆定一的处置是那样的铁面决绝，毫不留情，毫不客气。这固不排除权力场上个人恩怨、挟私泄愤、幸灾乐祸、投石下井、投机取巧等诸多人性恶劣因素混入其中，但更多则是阶级斗争理论武装下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贯做法。与会者或政治行动者遵循最高权力的旨意，按照绝对服从的党组织原则，抓住陆定一的缺点和工作失误，任意放大，无限上纲上线，以此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证明，一方面显示对最高权力的效忠与紧跟，一方面表示对“阶级异己分子”的划界、批判与不屑。

至于陆定一打倒之后的悲惨境遇，则可从当年盛行一时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与“痛打落水狗”的话语主张中找到某种理论支撑，而这一支撑通向的仍是阶级斗争的大本营。“宜将剩勇追穷寇”是毛泽东抒发战争胜利情怀的名句，“痛打落水狗”为鲁迅思想文化论战的名言。把战争对敌的奋勇精神移用于对待自己的同志已是错乱，将鲁迅时代文化领域的思想主张不遗余力地用于政治社会斗争更是乱套。“痛打落水狗”本代表一种鲁迅精神，在鲁迅时代无疑具有积极的革命意义。然而，鲁迅时代言论较为自由，不同观点可以辩驳交锋，鲁迅主张“痛打落水狗”，另有林语堂等一方提倡“宽恕”与“宽容”。两种观点，各树一帜，读者自认亲疏归所，社会思想由是折中调合，达致平衡。但在言论一律的1960年代，从鲁迅时代文化思想领域诸多不同观点中，独取其一，用于政治斗争，没有了同情、宽容、仁慈、悲悯这些人间最基本也最宝贵的人道主义元素的中和平衡，社会思想与行为发生倾斜，而走向极端的绝决，变得冷酷无情，

实为必然。

因此，即便最杰出的党的领导人也对自己昔日生死患难的同志战友表现得毫无宽容，毫不手软，在其打倒之后更做出包括将其投入监狱和使其绝望的逐出教门等系列无情行为。阶级斗争利剑伤人，此处最见锋芒。陆定一出身于无锡一般实官僚家庭，1925年学生时代就投身革命；1937年从陕北到南京治病，接受家里二千多元遗产，将一千元作为党费交给中共驻南京办事处为办事经费，一千元给前妻亲属用于寻找失散的女儿费用，剩余几百元零钱，留为治病开支。因此之故，被认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受到严厉处置。在手握重权的党的领导看来，这种铁面严厉或许正是显示了维护革命的纯洁性与追求革命的彻底性，可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维护纯洁与追求彻底的另一面，是没有宽容的排拒，是走向绝决的极端，是充满冷酷的无情，而这恰恰就是革命业已走进死胡同，不得不要转身掉头的前兆与征象。文革的悲剧性收场即为最雄辩的证明，而后来80年代末广场悲剧的发生也不能不说与此种“没有宽容的排拒”与“绝决的极端”革命性有着某种令人心悸的幽暗关联。

对陆定一而言，背叛家庭而投身革命，把家留的私款捐作党费公款，本是高标的义举，反成获咎的罪状，信而见疑，忠而被弃，天下悲哀莫过于此。在毛泽东何尝又不是悲哀！对一位在关押之中仍表忠心“不能跟着走，爬着也要跟上去”（陆定一狱中上书语）的忠贞旧部不予宽宥，最终只能是落得形影相吊、孤家寡人的凄惨结局，平生自谓两大功业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于其一道身后即被否定，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果以阶级成分论，中央高层纯正地道工农出身者又有几人？就连毛泽东，论出身即便打上一半折扣，能够合格还是问题。既如此，严苛他人，以作莫须有罪名的藉口，足以见出阶级斗争观念的笼罩，同时，也未尝不射没有反躬自省与自知之明的权力的危害与虚伪。

除了培育发展人的仇恨、挑动人间互斗、败坏和谐的社会人际关系，无视法律，消解法治，是阶级斗争理论树上所结又一恶果。阶级斗争一核心内容是党领导下的阶级专政，既为党的领导，又是阶级专政，以司法独立为征象的法治自然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功能。司法不独，法治不立；法治不立，人治彰显；人治彰显，正义趋于流失；正义趋于流失，则冤假错案与社会动乱的接踵而至，不可避免。所以，公安机关甚至不是公安机关可以随便抓人，不经司法审判，可以任意关押监禁，且美其名曰“群众专政”。陆定一之被非法批斗、关押、囚禁，祸根乃源自于此。党领导下的阶级专政，一突出特点是以需要为目的，服从并服务于政治大局。因此，它常常遵循领导旨意或意图，立案审查，先抓人再找证据，没有证据就逼供虚构，是故，极易沦为用于陷构忠良、迫害无辜的工具，成为制造冤假错案的工场。陆定一被关押，是为了审查“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修正主义分子的“政治需要”；被监禁，是服从并服务于文化大革命“大局”，以此证明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的必然与必要。可以说，就是在这一“需要”与“大局”名义下，陆定一被架上文革的祭坛，成为牺牲品的。

文革后包括陆定一在内劫后余生的中央高层痛定思痛，认识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危害，果断中止这一理论，转而将治政目标指向经济建设，中国才有别开生面的今天。中央高层抛弃“阶级斗争”的同时，对“群众专政”的厉害心存余悸，正确地将“群众专政”一并予以了抛弃。然而，囿于传统认识，在实际中，抛弃的只是“群众”，而对“专政”依旧情有独钟。殊不知，司法所以不独，法治所以不立，冤假错案所以迭出不断，原因不在“群众”，而在“专政”，“群众”只是装饰前缀，“专政”才是实质根本。文革之后的80年代，高层同样有无罪而不得自由者，没有“群众”，照旧“专政”——被非法监禁，以至终身。“专政”对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的隐形危害，有如“斗争”对世道人心与社会和谐的明显破坏，惜乎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深刻反思，是遗留于今日的最大遗憾。

文革结束已35载，陆定一离世也15年，但陆定一文革遭遇给世人留下的历史教训无疑

是极为深刻而惨痛的——一场有可能正常的权力更替演变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动荡与民族浩劫；一次充其量不过人事变更的“茶杯风波”发展成骇人听闻的人身迫害——需要人们不断地深入反思，永记不忘，以防悲剧的再次发生。

最后，需要回应陆定一何以自认为被林彪而不是毛泽东所打倒。这或许是对前者恨之切而对后者爱之深的缘故。中共第一代高层对毛泽东多有一种无法释解的领袖崇拜情结，因此对诸多关涉毛泽东的问题不能看得真切，苏东坡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正此之谓也。

2011-9-29 初稿，2011-10-9 二稿

□ 原载：《共识网》2011-10-26

~~~~~  
【学术争鸣】

文革——一个还是两个，这是一个问题

• 刘 仰 •

十月上旬在成都大邑参加研讨会时，徐友渔先生也有一个主题发言，内容是关于文革。具体发言记录以及后面的讨论，大家可以到杨帆教授的博客上阅读，我就不转帖了（见本刊zk1111b——编者按）。徐友渔的主题发言和后面的讨论都挺有意思，我在现场没有参与，只是听大家说。虽然当时有些想法，但我想还是不说为妙，说了难免引起冲突和争论。要说言论自由，还是有的，我不想说，也是自由。如今换一个地方说。写文章比临时即兴发言更加周全点，这也是言论自由。

徐友渔的发言主要阐述了关于文革的一种观点，即“两个文革”。它并不是新观点，徐友渔说：两个文革在“文革学”中，“是吸引讨论、研究、争论的人数最多，观点最多，争论最激烈、最集中，而且最长期的一个学说”。徐友渔说，他原来反对“两个文革”的说法，在这个问题上还与秦晖有争执，但徐友渔现在开始向“两个文革”靠拢一点。为什么？徐友渔说，因为它有现实意义，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对文革说好话的思潮就越来越升温”。那么，究竟什么是“两个文革”？

所谓两个文革，一是“毛泽东的文革”，二是“人民的文革”。再明确点，“毛泽东的文革”是指权力斗争，“人民的文革”是指社会矛盾。“两个文革”的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他出于权力斗争需要的个人行为。但是，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也的确有各种冲突和矛盾，“人民的文革”便与“毛泽东的文革”在最初形成了合流。越到后来，两者越来越分道扬镳。徐友渔引用的观点认为，到了西历1976年，“人民的文革”终于占了上风，取代了“毛泽东的文革”。这一观点很有迷惑性，与会者中，徐友渔、秦晖、萧功秦等人对这一观点的态度也显得扑朔迷离，值得探讨一番。

我认为，两个文革的观点之所以出现并有一定市场，关键在于对文革的认识。如果文革全是坏的，要全盘彻底否定，那么，分两个文革或者100个文革都没什么意义。之所以要分“两个文革”，根本原因在于，很多文革的经历者和研究者都认识到，文革并非彻底不好，而确有它积极的一面。国内不少经历过文革的人，现已进入老年。很多人说起当年的经历，常常把“青春无悔”或“无悔的青春”挂在嘴边。这并不是矫情，而是一种真实的感受，只不过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清晰表达而已。一些过来人甚至直接喊出“我不忏悔”；一些写作文革题材的作家，

自身也是亲历者，他们在作品中、现实中都对文革表达出爱恨交织的感情。我知道一位已经住在美国的文化革命亲历者经常回国，每次必定要到天安门广场去看一眼，因为那里有他当年的记忆，他说很多事情他至今还没想明白。

当我们意识到文革有它的合理性，再来看“两个文革”的观点，就会有新的认识。“两个文革”观点的核心在于：文革的合理性只在于群众，那些造反派，而不在于毛泽东。换句话说，“两个文革”的观点有一个预设的前提：毛泽东是错的，是为了个人地位而搞权力斗争。但在另一方面，那时的中国的确存在各种社会矛盾，例如官民矛盾、社会不公等，“人民的文化革命”就是这一社会矛盾的体现。所以我们看到“两个文革”的核心是：把文革坏的方面都归于毛泽东，在否定毛泽东的问题上，丝毫不松口、不退后，把毛泽东个人与“人民的文化革命”对立起来。我认为，徐友渔说他原先反对“两个文革”的观点，关键在于他原先不认为文革有合理性。现在他的观点有所转向，是因为他现在不得不意识到文革确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这个问题上，他依然犹犹豫豫。因此，徐友渔说，他现在虽然向“两个文革”的观点靠拢了一些，但基本还是坚持“一个文革”。他的理由是：“人民的文化革命”虽然存在，但微不足道。换句话说，徐友渔认为，文革的合理性虽然的确有，但不重要。

那么，就算“两个文革”的观点肯定了文革合理性的存在，我们能够接受这一观点吗？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必须回答另一个问题：文革的合理性究竟只体现在毛泽东之外的基层群众身上，还是在毛泽东身上同样有体现？徐友渔说：“实际上现在随着中国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毛泽东的文化革命理论对现在、对当代影响反映出来是越来越深了。毛主席提出的人民群众、革命群众‘造反有理’，提出了‘打倒走资派’，提出了应该有大民主的这些理论。当初提出时，中国革命搞得那么左，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市场经济影儿都没有，显得有些牵强附会。后来中国搞了市场经济，有那么多贪官污吏，现在说成是‘走资派’，大家觉得越来越有道理，甚至比毛泽东当年搞文化革命时宣传的还要有道理。毛泽东当时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这显得有些荒谬，资产阶级怎么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里？大家觉得这个很荒谬。现在，很多人认为这个说法证明了毛泽东的远见和英明，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特权阶层，贪污腐化，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因为现在搞的是市场经济。”

徐友渔还说到：“在80年代的时候毛泽东这套理论没有人信，陈云和邓小平否定文革的说法是非常深入人心的。后来特权阶层越来越严重，特殊利益集团越来越严重。尤其搞了市场经济以后，‘走资派’这个概念的似乎合理性越来越凸显，荒谬性越来越淡漠的情况下，大家就非常相信这种理论。我自己的研究，我做调查就知道，到了春节的时候，河南省的一些群众、下岗工人出来游行，他们打的旗帜是毛主席的旗帜，拿的画像是毛主席的画像，他们的口号也是当初文化大革命那些‘打倒特权阶层’的口号，这点很值得注意。”从徐友渔的这段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徐友渔也承认文革的合理性既体现在民众那里，也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然而关键是，徐友渔基于否定毛泽东的既定观念，他内心不愿承认文革的合理性来自毛泽东，只愿有条件地承认来自基层群众。这也是徐友渔对于“两个文革”的观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原因，他想坚持“一个文革”的观点，还是想彻底否定文革。

我其实像徐友渔过去一样反对“两个文革”的观点，杨帆在讨论会上也持这一观点，但我的看法与杨帆也不完全一样。杨帆的观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这里我不再引述。我认为，文革的合理性与破坏性是不能割裂的，它们都体现在毛泽东那里。所谓毛泽东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与社会矛盾有着必然的联系。否定毛泽东的人，喜欢将其称为“权力斗争”，而我宁愿称之为“路线斗争”，它的目的无非是解决已经隐含或已经出现的社会矛盾，而非仅仅是针对某个人、某个权利位置。如果两人的政治观念完全一样或非常近似，耍点手段，你下我上，我们可以认为是权力斗争。当政治理念不同，对于社会现实的基本判断不同，谁掌握权力便是对全社会的巨大影响和改变。徐友渔也意识到，当年批判“走资派”与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有密切的相关

性，那么，徐友渔是否认为，在那个年代是被夸大了，或者仅仅只是毛泽东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对全国人民进行的欺骗？因此，我与徐友渔观点的差异在于，虽然同样认为只有“一个文革”，但我认为，文革的合理性同样源自于毛泽东本人，而徐友渔不太愿意承认这一合理性，即便勉强承认，也认为它不属于毛泽东。

对此，萧功秦的发言比较有意思。萧功秦说：“我是在座各位岁数最大的。我在文革开始的时候已经是造反派了，我是工厂造反派的副部长，而且是我们工厂造反大队票数最高当选的一个大队队委，我还是比较了解工厂的文革。所以我觉得徐友渔谈的观点有一点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人民文革说’只是‘毛泽东文革’的一个衍生品，而且从计算数量上来讲人并不多”。“只有极少数人，比如像我这种人，我开始的时候也是很浪漫的，觉得毛主席就是要建立一个红彤彤的民主世界，巴黎公社，将来我们就民主了，我是相信的。”我理解萧功秦的话，意思大概就是说，他当年就怀抱着民主的理想，响应毛主席号召投身文革，成为造反派骨干，结果发现被毛主席骗了。因此，他现在继续当年自己的主张，回到当年“人民文革”的立场，开始推进当今中国的民主。

于是我们发现一个很神奇的连接：当年的造反派，与今天的民主派有着必然的逻辑联系。对此，秦晖把话说白了。秦晖在讨论中说：“从造反派变成了民主派”，“造反派是民主派的先声”，“我是不同意的，这一点我同意徐友渔的说法”。秦晖表明了态度，他不认为当年的造反派就是今天的民主派，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秦晖比较接受“两个文革”的观点，他当年也参加过造反派。秦晖说，当年他参加的造反派最终没有掌权，而是被镇压的。这确实是文革期间派别众多的一个现象。现在有人将当年的这一现象称为“结社自由”，虽然比较牵强，但也有点道理。秦晖说，当年他参加的造反派虽没有掌权，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控制了一块地盘，他们称为“解放区”，这个造反派的“解放区”主要是南宁市的“贫民窟”。因此，秦晖认为，文革的确有社会冲突的成分，这也是他比较认可“两个文革”观点的原因。但是，秦晖与徐友渔还有一点不同，徐友渔认为文革的合理性虽然微不足道，但来自基层群众，与毛泽东无关。而秦晖认为“人民文革”的合理性来自于“奉旨造反”。也就是说，秦晖某种程度上认为，文革的合理性的确是来自于毛泽东。当然，这就牵涉到另一个问题，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在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毛泽东的动机就是个人原因，因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当年像秦晖、萧功秦那样怀抱民主理想投身造反派的人是被毛泽东的表面文章蒙骗了。毛泽东的动机是另一个大问题，讨论会上没有展开，只是简单提到，我这里也不展开了。

那么，当年的造反派究竟是不是就是今天的民主派？秦晖虽然不承认，但我认为，将其等同显然不合适，但认为他们有一致性，其实是有道理的。徐友渔所举的例子中，大力主张“两个文革”观点的人，大多在海外，或者已经去世或淡出历史舞台。这些人大多经历过文革，虽然在文革中的表现不尽相同，但他们的确都成为民主派。对于他们来说，“青春无悔”、“我不忏悔”并不是矫揉造作，而是真实心态，这一真实心态其实与秦晖等人一样。只不过在不同位置上，面对不同的处境，每个人对当初延续至今的这一心态的态度很不相同。在国内有“三种人”之说，如果承认两者的关联，对于基层普通人无大所谓，但对于在社会舞台上的活跃者来说，那就与自己的当前利益有很大关联。而在海外的那些民运人士则无此担忧。海外民运中更年轻一点的人，可能因为年龄和经历的原因，没能自我意识到这个关联，但事实上，两者还是有类似的。当秦晖说当年的造反派是“奉旨造反”，按照这一逻辑，改革是否也是“奉旨改革”？当今的民主派是否也是“奉旨民主”？秦晖说“两个文革”的时候，用开始的“奉旨造反”与后来的“抗旨造反”来形容，对于当今中国的所谓民主派来说，岂不也很相似？从“奉旨民主”到“抗旨民主”，都能在他们今天的实践中找到对应。

这个话题实际上牵涉到一个更大的话题，即对民主的理解。当我们认可文革的合理性、认可社会矛盾对于文革出现的必然性，实际上也是对文革民主性的认可。而“两个文革”的观点



将文革的民主性从毛泽东身上排除，只接受民众造反的民主性。从文革合理性的角度说，它是对当今“走资派”引发的社会矛盾的自然延续，甚至可以将当年的文革看成是一场预演。“一个文革”的观点稍微复杂点，一种是彻底否定文革，不认可它有任何合理性；另一种是将文革的合理性与毛泽东结合为一体。这也正是吾友黄纪苏先生所说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最大的造反派。换句话说，我的“一个文革”的观点将文革的合理性看成是毛泽东与基层民众民主意愿的一致性，而非将其割裂。

那么，它涉及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认可文革的合理性，又像徐友渔那样从当今中国现实看到了文革的矛头所指，我们是否应该接受今天某些西方左派依然坚持的观点：文革应该时不时地再来一次？我认为不可能，也不应该。在成都大邑讨论会上，绝大多数与会者也认为不可能。首先，认可文革的合理性是指它的理念，未必等于认可文革的手段。文革看到的“走资派”问题与今天有一致性，未必等于文革解决“走资派”问题的方法就正确。我想，这种一分为二的态度是应该的。其次，认可文革所具有的民主性，不等于认可文革对于民主的理解。民主的观念呈现相当大的多样性、复杂性，即便像秦晖、徐友渔、萧功秦这样当年都是造反派的一员，他们对于民主的理解、对于民主的制度方式也未必相同。那么，今天的民主派也一样。事实上，反对今天的所谓民主派也并不等于反对民主，只是对于民主的理解不同。当我们看到当年的造反派与今天的所谓民主派有一致性的时候，我们也就更能理解当今中国为何要对文革的破坏性抱有相当的警惕。因为，当今“奉旨民主”的所谓民主派，很有可能让中国重蹈文革的破坏性，甚至因为他们当年未能彻底如愿，而使得破坏性更大。

对于文革的确需要客观分析。彻底否定与绝对拥护，都不可取。文革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破坏性，对此，我们应该冷静分析，认清真正原因。如此，才有可能吸收它的合理价值，并汲取教训，排除它的破坏性。我认为，对此问题，中国还需较长的时间，并在新的实践中不断总结。

□ 原载：作者博客

## 【它山之石】

### 一个韩国人眼中的“文化大革命”

• 金宰贤 •

“彻底打倒，彻底……”他在抄写的是1967年的一份《解放日报》的头版文章。我在上海图书馆经常碰到这样一位老人：个子较矮且瘦，动不动就自言自语，使得敏感的我不得不注意他。老实说，一开始我并不喜欢这位老人，但从那天起，我对他不再那么反感，而开始好奇到底是怎样的心灵创伤让他至今还抄写着30多年前的报纸。

我虽然通过一些书籍和电影了解了“文革”时期人们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但亲眼看到一个时代给个体的伤痕时才意识到它的影响有多么深刻。“文化大革命”给韩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不少影响。

当时，权威主义政权统治韩国的时候，它们实施了严格的反共教育。那时韩国人对中国几乎一无所知，我们经常把它称之为被竹幕（Bamboo curtain）遮蔽的中国。这两个因素反而使得韩国学生运动家对“文化大革命”产生了好奇。在这样的基础上，一位思想进步的教授撰写了一本书，介绍了西方对“文革”的较为善意的评论，并高度评价“文革”：它是以民众的自觉性和献身精神来颠覆既定权威的社会改造。这本书令韩国大学运动组织在整个80年代对“文

革”一直抱有颇为欣赏的态度。后来，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随着交流的增加，韩国对“文革”的认识也逐渐深入，进而抹去了对“文革”的憧憬。我对“文革”的印象也是从学中文以后开始形成的。在中国生活了好几年之后，我才渐渐地了解“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显著影响就是传统文化的破坏。由于我在大学读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来中国之前，我对中国传统文化抱有很大的期待。不过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实际的中国与在书上学的截然不同。中国真的是这样吗？我越了解中国越觉得它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以前，我以1949年为界：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它就与以前的中国划清了界限。但后来知道界线不是1949年，而应是“文化大革命”。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大搞“批林批孔”的运动，“祭孔”被视为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当时许多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文物古迹都被红卫兵破坏了。眼下参观孔庙的很多韩国游客，看到很多雕刻和石碑被毁的伤痕时，都不禁伤感。文化遗迹毁坏成这样，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难以保存。据说，曲阜的孔庙恢复祭孔大典前，专程派人前往韩国录制了整个祭孔的过程。他们特别注重的是“文庙祭礼乐”，因为中国早已失去了完整的文庙祭礼乐。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旦失去了，以后就很难恢复其完整的原型。好在被儒家熏陶的韩国至今依旧保存了这个传统。据中国媒体报道，祭孔祀典礼仪自传到朝鲜半岛后，尽管随着历代王朝的变迁，在音乐和舞蹈以及规模、等级等领域进行了调整，其礼仪的基本程序却一直沿袭中国周代雅乐的规范。

对韩国人而言，祭孔大典是从小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韩国成均馆和全国各地234个乡校，于每年5月11日孔子祭日和9月28日孔子诞辰日，进行两次“释奠大祭”。成均馆文庙大成殿中供奉着的是包括孔子在内的五圣，孔门十哲，宋朝六贤以及韩国十八贤等三十九位先圣、先贤的牌位。1986年，释奠大祭已经成为了韩国重要无形文化遗产第85号。

我觉得如果外国人，甚至中国人，要了解真正的中国，他必须先要了解“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对中国的最大影响无疑就是与过去、与传统的断裂。我认为，“文革”不仅仅是失去的10年，更是断裂的10年。中国人常说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但其保存的只不过是紫禁城、长城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并没保存好精神文明的精髓。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曾经否定过自己的历史以及传统等精神文明，但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没来得及修复这个问题，随后他们很快又进入了“改革开放”时期。这样的结果是中国无批判地接受了西方文明，并且它接受的都是浅层次的、表面上的物质文明，并没有接受深层次的精神文明。当今中国之所以频发种种事故，也是因为缺乏精神文明的建设。中国在硬件上已经开始“超英赶美”，但其软件上却没有树立好新的体系。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硬件上的显著提高，硬件与软件上的差异逐步扩大。众所周知，精神文明才是西方文明的精髓，并且西方国家在精神文明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物质文明的辉煌成就，但中国却忽略了这个事实。

很显然，这样的结果并不理想。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破坏了人性和基本的道德：儿女告发父母、学生告发老师、邻居告发邻居、朋友告发朋友，突然间最熟悉的人成为自己的敌人，以最极端的方式将“道德”连根拔起。此后，中国只去吸纳西方的物质文明，社会愈加功利和浮躁，在一切都向“钱”看的同时，使得仅存的那么一点“道义”随之贬值。

外国学者常说，“文化大革命”虽然发生在中国，但对它的研究却不在中国。考虑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在被政治狂热席卷的中国，人们遭到了莫大的痛苦，也不难理解中国对“文革”的态度较为消极。但我仍然认为，对中国而言，“文化大革命”不是应该回避的对象，而是应该克服的对象。中国只有在充分理解“文革”并克服它留下的伤痕以后，才能真正地向前迈进更

大的一步。

□ 原载《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11-10-9

~~~~~

## 【劫后反思】

### 我在“文革”中的思想历程

• 刘泽华 •

我入党的时间不算是长的，但算起来也接近60年了。“文革”以前我是一个虔诚的信徒，把领袖视为神明，我写过两首打油诗来说自己。

一首是“走神”：

信到迷信不知悟，朝三暮四全维护。睁着大眼一走神，多情反被多情误。

一首是“听喝”：

衣食住行听安排，找个对象领导裁。是非全赖上头论，只有屎尿自己来。

这不是调侃、嘲讽，是自己的真实写照。“文革”促使我的思想发生了大的转变，我在过去多篇文章说过，我逐渐抛却了“神明”，而萌生出“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理念。诸位一看就知道，这是从“上帝在我心中”套过来的。尽管马克思本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时至今日，他提供的学说仍然是诸多学说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马克思主义在我心中”至少使我的心境能获得了安稳。我是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由是我得出两点自箴：一是“史家面前无定论”，一是“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历史的一切都是认识对象，都要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在证据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也都应服从证据。

就我而言，观念的转变很复杂、漫长，也很曲折，至今还有诸多理不清的心绪。所以“在我心中”绝对不如“听喝”省心。

大致说，到了“文革”后期我就不再“跟”了，而且在思想上开始进行批判，但也仅仅是写在日记里。我拥护周、邓，矛头所向也很清楚，如果当时日记落入专政者手中，我可能会毙命。现在大概也难有刊物能刊出。那时我内心极端苦闷，只有靠日记来诉说，我从周总理逝世那天起写日记，文中引了马克思的一句话：“如果他不能讲话，那就行动。如果不能行动，那就宁肯一言不发。”（这是日记中写的，没有核对原文）我很怯懦，采取的是后者。

下边写的几个镜头只是一个侧面。

#### 一、我在“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面前

“文革”期间，四个“伟大”喊的震天响，我不敢有什么异议。不过对陶铸说的，太阳里也有黑点，私下里认为是很有道理的。对林彪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一类的话，我想不需要“上智”，都能感觉出拍马屁的味道，但那时是绝对不能提出异议的。老百姓天天要唱一首歌，其中一句就是：“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她，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在那种情况下，人们仅有的一点才智已经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曲直，而是用来如何保护自己，免遭不虞之祸。我虽然对林彪的话感到不顺耳，可我绝对不敢去触犯，更谈不上公开反对。自我解释，这是政治家们的语言和政治需要。

“文革”把毛泽东推到了顶峰，但到了顶峰也就该出问题了，这是无法逃脱的规律，而辩证法又指明了人们分析这种现象的路径。过去的很多错事，上下一致的打、吓、瞒、哄、骗，还真的有效果，比如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竟然不了了之，三面红旗依然高高飘扬，彭大将军依然被视为大逆不道。造反派反这个反那个，看来毫无禁忌，但竟然没有一个造反派为彭大将军伸冤，相反倒是最革命的造反派充当了置彭德怀于死地的打手。文革中的老老少少都是吃过三面红旗苦头的人，可是竟然都还高举着它，横扫天下，凡是对三面红旗发疑或批评的人都再遭洗劫。远的不说，南开大学经济系一位青年教师徐振芳（现年八十、健在）同志当时从理论上论述了价值规律与社会主义再认识，批评了“公社化”，全国大饥荒与饿死人等，并致信中央，要党主席毛泽东检查，谢罪天下。这一下子惹了大锅，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革”一来再重新算账，被整得死去活来。由此可知当时对毛泽东是不能分析的，对毛泽东思想除了无限崇拜外，更不能提出任何疑问。

可是“文革”中乱七八糟的事就摆在人们的眼前，让人们开始怀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正确论。既然辩证法告诉人们，无论什么都是可以分析的，毛泽东也一再说，一分为二是普遍规律，1964年他同日本物理学家谈话时，讲一分为二是无限的，他很肯定庄子说的话：“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当把毛泽东思想推到极限的时候，也就是人们开始生疑的时候。于是人们发出疑问：“毛泽东思想能一分为二吗？”我想当时很多人对这个问题心中是有数的，但聪明人没有敢说的，只有不要命的“冒失鬼”才敢较真。大约是在1968年，我的一位学生竟公开放言：“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他的名字叫刘培庚，东北丹东人，根红苗正，又是中共预备党员。此言一出，立刻乌云压身，大会批，小会斗，停止他的工作（工宣队进校，他在机关报《工农战报》当编辑），停止党员登记。周围没有人敢与他交往，往日的朋友最多道路以目，孤独、苦闷、憋气，几乎要发疯！

他在苦恼之极时来找我，问我在哲学上他的观点是否有问题？这一问立刻让我胆战心惊，面对我的学生，该怎么办呢？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无论从哲学上或事实上说，我心里是赞成他的观点的，可我不敢给予公开的支持；面对自己的学生，又不能说官话，也不能说太违心的话，但也不敢说真话！再三思索之后，我做了这样的回答：一分为二既然是普遍的规律，适用于任何现象，从哲学观点上说没有错，可我就是不点明“毛泽东思想也应一分为二”这句话。我虽然很相信这位学生，但那时的“逼供信”整死了不少人，也逼得不少人神经错乱，瞎咬一通，我不能不有所戒备，所以我只说哲学道理，绝不说这几个字。接下来我对他说，在目前形势下说这种话不适宜，会让人抓住把柄。他问我怎么办？我再三掂量后，建议他不要在理论上纠缠，只说受了怀疑思潮的影响，没有深思，政治上幼稚；对别人的批判不要顶，态度要温顺。你是学生，又不是头头，没有任何职务，也没有干过任何出圈的事，估计批一通也就完了，不至于戴什么帽子。我又叮嘱他，千万不要往下说一分为二的具体内容，不管怎么压和诱导，都不要说，一破口，就无法收拾。刘培庚真的照此应对，折腾了一段时间，他毕竟是个青年学生，放了他一把。最后还是给了一碗饭吃，发配到偏远的农村当了一名中学教师。

二十年过去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突然一天刘培庚来到我家。他带给我一件礼物，是岫山玉雕的喜鹊登梅。我说，你来看我非常高兴，但我有自己的规矩，不能收你这个玉雕！他说，给我平反了，现任某党校的教育长，总算是个喜事吧！二十年来，我一直念念不忘老师的恩情，我这点心意，老师不能不收吧！他还说，那件事情之后，成了瘟神。离开学校时没有一个人来送行，只有老师您到车站来送我，并鼓励我要坚强。车开动了，您还久久伫立在车站目送我，我止不住地流下了眼泪！

回想起来，我很惭愧，与其说我伸出了同情之手，不如说我怯懦、圆滑和世故。

“文革”后承认了毛泽东的诸多错误，在思想理论上也有不少纠正，但“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依然不能作为一个严肃的理论命题和历史问题让人思考。某些人依然高举“毛泽东思想”的大旗，还说“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结晶”云云，以此禁止这个问题的深入展开。“集体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两者是两个不同的命题，“集体的结晶”另论，但无论如何不能遮盖后一个命题。把毛泽东诸多错误言行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天下有比这更滑稽的吗？

对毛泽东思想要不要“一分为二”？这是一个极大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关系着中国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命运。毛泽东思想有过辉煌的时期，1949年之前确实指引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大史学范围（世界范围内史学）看，不管人们的评价有多大分歧，但作为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但1949年以后，他违背了自己的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思想与实践，以他特殊的历史地位和绝对权威，硬要实行他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并以极端的阶级斗争作为基本手段，一步一步走到“文革”这种荒谬的时期，把整个中国搞乱了。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在实践与理论上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着“一分为二”，但仍没有提到应有高度来认识，在许多时候这个命题尚没有获得“合法性”和“正当性”。我是一个从事历史教学与研究的人，且主要是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我的重点尽管不是近现代史，但每每也有涉及。我深深感到远没有尊重“一分为二”的“合法性”和“正当性”，有时仍以“毛泽东思想”为神圣，拒绝、阻止进行“一分为二”性的研究，或“垄断”再认识的权力。

从历史学的角度说，没有神圣不可再认识的东西。我应该把“毛泽东思想要一分为二”作为理论命题和历史命题来看待，在认识对象面前人人有平等的认识权力。人们如何“一分为二”，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但必须尊重“毛泽东思想应一分为二”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只要言之有据，就有合法存在的理由。不管何种见解，都必须拿出确凿的证据来，在证据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有些人不把“毛泽东思想”当作理论和历史事实，仅仅视为“信仰”，那就是“宗教”性的问题了，这与科学性的认识是另一回事，正像有些人信佛祖、上帝一样，是宗教信仰问题，不必与这些人争议。但现代社会有一条基本原则，就是宗教不能干预政治与他人的社会生活。如果还坚持政教合一，那显然是前现代社会里的事，如果硬要坚持，不妨请他们去某个地方建立太阳城，进行试验好了。但不要强迫他人与自己一样也必须“信仰”，更不应企图借助行政力量实施什么强压。

我对毛泽东思想信仰过，而且信到迷信的程度，具有很强的“宗教性”。我入党已近一个甲子年，总的来说，也还是个积极的党员。在巨大事实面前，我的观念逐渐发生了转变，这就是把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论和历史问题来看待，也认定“毛泽东思想一分为二”是个合理、合法的命题。

## 二、《矛盾论》有抄袭之嫌

1970年秋，我们逐渐听到如日中天的陈伯达被揪出来，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骗子”。我一方面很震惊，不知此论从何说起？另一方面，我对陈也没有好感，揪出来感到很痛快。但疑问也发生了，他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的理论与行为如何看待？我无法得到解答。1971年夏，学校革委会宣传部门组织了几个人来清理陈伯达的假马克思主义言论。召集人是牛星熙，成员有经济系的郭士浩、哲学系的封毓昌、还有我，共四人。当时很神秘，对外保密。图书馆拨给我们一间房子，任何人不得进入。我们直接到书库提书和杂志、报纸。时值酷夏，不能开门对流，热得要死。给我们的任务是整理陈的假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上哪里去找呢？我记不清是上边的指示，还是我们自己拟出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不能有损毛主席的和林副主席（我们当时还不知道整陈的背后是整林副主席）。只要是毛主席批准的文章或肯定过的，不能列出来，不能从中找问题；第二、不能损伤文化大

革命的理论、方针和路线，陈的有关文章与讲话，凡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的，不能批。第三、陈过去的著作很多，凡属中央领导人肯定过的，或代表中央的文字不能轻易动，如《四大家族》、《人民公敌蒋介石》等等。有了这三条，我们实在难发现有什么“假”和“反”的问题。我们四位彼此虽然都认识，但互相之间并没有深交，谁也不敢多嘴，很怕踩了“红线”，更怕人说借批陈指向“文革”，指向毛主席革命路线。于是把清理重点放在陈的早期著作。我们对陈的历史了解的很少，又没有适当的索引，只知道他30年代在北京、天津教过书，搞过“新启蒙”，写过一些文章，但哪些是他的，我们并不清楚，特别是以笔名发表的，更是一无所知。只好“广撒网”，把一些可疑的书刊尽量找来审查。其中有一本《社会学大纲》，没有署名，但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著作，是“河北商专”的教材，石印本，大约是上世纪30年代初印刷。陈伯达在那个时期活动于京津一带，于是怀疑是他的著作。此书由封毓昌查阅。这本书中主要论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论述“矛盾”问题上，封毓昌发现与毛泽东的《矛盾论》多有雷同之处。他不敢声张，悄悄地让我看，果如他所言，在论述矛盾的普遍性、主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等观点上，有些语句几乎相同。我们两人窃窃商议，是否告诉另外二人，我建议要告诉，我们是一个集体，不说反而易引起麻烦。封毓昌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请牛星熙和郭士浩也看了。四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不愿首先把问题挑开。牛星熙是召集人，四人商定了两条：一是不扩散；二是把书封存。我当时冒出一个念头，伟大的领袖的“顶峰性”的著作原来也有抄袭？！

到70年代末，我多次建议封毓昌同志把这件事弄清楚，封毓昌下了一些功夫，找到了《社会学大纲》的作者是杨秀峰。杨秀峰是当年的教授，已是共产党员，1949年后任过河北省省长、教育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封毓昌给杨秀峰去信询问。杨请他的秘书给封毓昌回了信，证实了该书的作者就是杨秀峰。但同时转述了杨的意见，此事不要提了，《大纲》中的论述也不是他的创见，是从苏联学者转述过来的。后来我多次请封毓昌从学术史的角度把事情写出来，他总说等等、等等，等到现在，他和我都老了！他比我聋得更厉害，几乎全失聪。我写字条让他把事情公布出来，他写字条回应：《社会学大纲》图书馆找不到了，不知去向，无法核对。又说，老了，不找麻烦了。

因是封毓昌首先发现的，我也不好插手。不知还有人关注此事否？

### 三、“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从我加入共产党始，就立志消灭剥削、消灭资本主义。在我的观念中，是容不得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所谓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直在地下流动，大饥荒时期在政策上也曾一度允许“三自一包”和农村的集市贸易，但随着1963年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四清”运动，“三自一包”被取消，集市贸易又被禁止。“文革”中强行割资本主义尾巴，自发的资本主义活动都转入地下，称为“黑市场”。我一直保持着“纯洁”的态度，不与任何“黑市场”发生关系。

1973年，我带领一个级的学生“拉练”（模仿军队长途行军），横穿河北，从完县经保定、白洋淀地区到天津。沿途我们看到自发的资本主义很活跃，我与农民闲聊，我问，不是有政策不允许这类的活动吗？农民悉数了他们的公社的苦楚，有一位农民说了一句话：“社会主义不够，资本主义补！”

这句话深深打动了我的思绪，启开了我的再思，把我多年来积累的疑问提到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是啊，为什么“社会主义不够？”为什么要由“资本主义补？”

“不够”，这是中国的一个长期存在的历史问题，于是有理想，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曾承诺解决“不够”的难题，也是我追随的目的。但自从“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不够”的问

题越来越严重，公社化竟然饿死数千万人。“三自一包”救了数亿人的生命，转眼又成“罪恶”，“文革”发展到极致。当我听到“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时，我仅仅感到把“草”和“苗”对立起来，冠上社会性质，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荒唐。记得当时还有过一篇报道农村革命人物事迹的文章，引用一句俚语“花钱买笼屉，不蒸馒头，蒸（争）口气”，把资本主义尾巴说成是“馒头”，把坚持社会主义说成“气”，我一听也很反感，怎么如此不伦不类的乱比喻？不要“馒头”，靠“气”就能充饥？我看到了农民与市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欢迎和参与，但我没有“资本主义补”的观念和意识。

对于社会主义的“不够”，我们这把年纪的普通人都深有体验。也是上个世纪70年代初，我一次路过保定，去了一家饭馆吃饭。饭刚上来，就有一群乞食者伸过手来，同时出示盖着村政府红印的出身证明，都是贫下中农。我问这是怎么回事？答曰：我们没有吃的，但地主富农不能出来乞讨，那是给社会主义抹黑。我感到万分惊讶，天呀，乞讨都要凭成分，是“社会主义”支柱者的特权！？

“不够”原因在哪里？我们多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目睹了各式各样的“出工不出力”、“龙多不治水”等等现象，也调查过农民的工分值低得可怜，一个工不值一张邮票（八分），还有的年终分不到红还需倒补，对此我仅仅与农村干部们水平和违法乱纪挂钩，从来没有与“社会主义”的“问题”连在一起，农民回答了这个问题：“不够”源于“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

农民的这句话，使我想到古人说的一句话：“公作则迟，私作则速”。迟、速就是效率问题，早在两千多年前古人就把问题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还要硬搞“公作”？农民为什么对“三自一包”那么钟爱？我们为什么不顺从农民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势力”，而一定要改造？这些问题困扰了我好几年，但有一点我逐渐走向清晰，当时通行的那种“社会主义”是造成“不够”的根源；反过来能“补”“不够”的“资本主义”未必不是一条路：多年来把“资本主义自发力”看成罪根，为什么不把它看成历史过程中的自然与必然？为什么说是“黑市”，“黑”字是谁给加上的？一个“黑”字就能堵住历史的必然？

农民的这句话对我是又一次大启蒙，此前的启蒙是那个“工程纪要”。“纪要”的启蒙是政治和政策；农民这句话的启蒙是社会道路问题，更深刻啊！

#### 四、他领错了路

从1949起到“文革”，我高呼“毛主席万岁”是真心实意，自觉的。“毛主席”在我心中几乎是真理的化身，是一尊神。

在1960年前后的困难时期，对毛虽然也萌生了一点点怀疑，比如反右倾、反彭德怀，心里认为是搞错了，但看到他致基层干部的一封信（纠正左的错误），便又改变了怀疑，认为主要错在下边的瞎指挥。南开经济系的一位教师上书党中央，对毛提出尖锐的批评，要他下“罪己诏”，我听说后一方面佩服他的勇气，另一方面看到他被肃整，大会批、小会斗，被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也十分惧怕，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把心里话说出来（也说了一点，比如说过生产关系走在了生产力的前头之类的话）。但随着经济形势逐渐见好，又恢复了往日的崇拜。凡属毛主席的指示，我基本不敢有任何怀疑的地方。有一些不理解，但也不敢正面提出疑问。比如他的1964年春节关于教育改革问题讲话，我就认为过于极端化，如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可以抄书，考60分就行等等，我在实践上是不执行的。

□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11年第9期

~~~~~  
【往事非烟】

徘徊在生死之间

• 叶志江 •

二〇〇七年十二月初的一天，清华教授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女士突然从美国打电话给我，询问我在文革时期的一些经历。

当黄肖路得知我所遭受的磨难后，她问我：“你从来没想到过自杀？”

自杀是文革中人们逃离苦难的现实世界最常见，也是最便捷的一种方式。许多自杀的事例都发生在文革初期，因为人们难以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经受住个人命运的突然逆转。

邓拓、吴晗和老舍，许许多多名人、要人在受辱之后选择了这一条路，自杀了。当然，文革时自杀的无名之辈更是罄竹难书。

他们死得干脆，在生死之间徘徊的时间可以小时或天数计算。

也有很多自杀未遂的，有名的如大将罗长子和邓家大公子，这无疑地延长了这些人徘徊的时间，短则数月，长则数年、数十年。

也算是一种报应，江青最后选择了这同一条路离开这个世界。

当我在生死之间徘徊时，我有过很多离奇的想法，但我倒是从来没有动过自杀的念头。这大概有点像鲁迅说过的那样：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文革初，我被游斗、戴高帽子、泼墨汁，被关在宿舍里供络绎不绝的人前来观赏。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我极尽挖苦嘲弄之能事，大大小小的批斗会更使我有口难辩。一夜之间，我从清华园中最“红”的学生变成最“黑”的人。这一落千丈的变化将我推到了生与死的悬崖边上。

要是想自杀，我当时可以找出上百条自杀的理由。但我没有自绝于人民，而是荒谬地梦想突如其来的一场战争将眼前的一切都化为乌有。说得雅一点，就是来一个玉石俱焚，和“人民”同归于尽。好在那些批斗我的人纵然可以编造出种种莫须有的罪名，也万万想不到我会“反动”到希望发生战争。

我当然软弱和害怕过。

这种软弱和害怕并非来自肉体上的折磨，也并非来自对今后命运的担忧。对于不谙世事的我来说，后者仅是一种虚幻的感觉，并不深切。文革初被批斗时我虽挨过打，但同清华百日大武斗时我在科学馆黑牢中所遭受的七次毒打相比，算是小巫。

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被唾弃、被羞辱后心理上的软弱和害怕。

这种心理上的软弱和害怕使得对所爱之人情感上的依恋成为许多人生死之间最后一道心理防线。



某日晚上，趁看守不在，我从宿舍溜出去寻找女友，惶惶然如丧家之犬。

在漆黑的夜幕下，我和她坐在一条小河沟边上交谈。

河沟边杂树丛生，浅浅的流水将校园分割成东西两区，我住东区她住西区。当我们坐在这条“界河”边上时，我未曾料到一条无形的鸿沟正在将我们分割成敌我双方。

我急切地向她解释那些对我的“揭发”都是不实之词，希望她为我作证，但她很茫然，淡淡地答我：“我并没有一直在你身边，那些事我也不知道。”

犹如五雷轰顶，我明白我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正在塌陷，那是我最为恐慌和害怕的一个晚上。

当时，我既将女友的信任作为精神上的唯一支柱，又极其害怕和担心女友会离我而去。在我被批斗的最初几天，她的父亲曾以延安整风时被错误批判的战友为例，要我们“相信党相信群众”，这使我得到很大的安慰。

不幸的是，当无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政治关系后，不仅是党和群众，就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再相信我了。

所幸的是，当她终于在极大的政治压力下被迫向我宣布“各走各的路”时，我没有精神崩溃，走上自杀这条路，而是大彻大悟，微笑着面对这场有点滑稽的悲剧，玩世不恭起来。

感谢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写了那本曾对我们这一代青年学生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小说：《牛虻》。

当琼玛误解亚瑟背叛革命而“挣脱了他的手，顺势打了他一个耳光”后，亚瑟成了牛虻。

挨了耳光后的亚瑟逃到了南美，在码头和甘蔗田里当苦力谋生。十三年后，当他回到意大利时，琼玛见到的是全身骨头被打碎后重新“组装”起来的“牛虻”，那个有点玩世不恭的革命家列瓦雷士先生。

既然挨了女友的“耳光”，既然幻想中的战争不可能，我也忽发奇想逃到南越去参加那里的抗美战争。

当革命群众忙于对我口诛笔伐时，我却沉浸在逃往南越的“伟大”计划中，幻想着用我在南越战场上流出的鲜血去洗刷那些强加在我头上的罪名，幻想着遍体鳞伤回到中国时，能像列瓦雷士先生一样去挖苦那些坐在沙龙里高谈阔论的假革命。

当然，要用阿Q式的中国语言：“革命？你们还不配……。”

我将一切逃亡路上可能有用的东西如小刀、药、钱和地图等都悄悄地藏在我的棉被中。

可惜的是毛泽东过早地回到北京，撤走了工作组，我头上的反革命帽子不翼而飞。这完全破坏了我的“战略部署”，使我的“援越计划”胎死腹中。

三十年后，当全班同学在清华园重聚，我再次见到我当时的女友时，她对于三十年前的那件往事似乎有点伤感。

我却觉得不必，就像牛虻临刑前给琼玛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你大可不必为从前那一记耳光的事情伤心。当然，那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比那沉重的打击，我受过多次数了，而且我都熬过来了，……。”

“不论我活着，或是我死掉，我都是一只快乐的大苍蝇。”三十年中，每当“生死关头”，我都会想起亚瑟和琼玛两小无猜时一起读过的这首小诗。

新译《牛虻》已将“快乐的大苍蝇”改译为“快乐的飞虻”。这大概更符合英文原义，但我喜欢旧译，那更俏皮，而且我从未见过飞虻，快乐的大苍蝇到处都有。

大多数自杀的人都不会像我这样“玩世不恭”，而是对人生十分认真。我的同班同学张怀怡在文革初期自杀而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张怀怡学习刻苦，严于律己，是中共预备党员和清华体操队的骨干。因为对基层干部在文革初被批斗不满，进而说了一些怀疑林彪的话，他被人告发。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在清华体育代表队“文革领导小组”准备对张怀怡进行大会批斗前一小时，他乘人不备跳楼自杀。跳楼前他留下遗书，上面写着：“毛主席我永远忠于你！！我决不是反革命！！！我死后留下的一切都作为党费。”

他至死都无法理解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亲自发动了这场将他逼上绝路的“大革命”。

他在跳楼前几天中凝重的神情至今还留在代表队学生的记忆中，那是他在生死之间徘徊，作着最后的抉择。

我闻讯赶到跳楼现场后，同代表队学生周启博一起用平板三轮车将张怀怡送到校医院。因伤势严重，校医院用救护车将他转送清华大学附近的北医三院，该院医生检查后又建议立即转送以脑外科著称的阜外医院。

据在现场的人说，他在跳下时完成了人生最后一个体操动作，确保脑袋着地。在我将他送往医院的路上，他或许还有知觉，还试图将医生检查时解开的裤子拉上。他当时已经七窍流血，救护车上的小护士一边给他擦拭，一边直掉眼泪。

这最后一个体操动作和拉裤子的动作说明张怀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人生依旧那么认真。

在张怀怡被送入阜外医院急救室后不到半小时，参加抢救的医生便走出来宣布他不治身亡。我很后悔因为缺乏经验，没有将他直接送到阜外医院抢救，但医生安慰我说，张怀怡的大脑完全撞坏了，即使在跳楼的地方有一座最现代化的医院也救不了他。

可见张怀怡自杀时下了多大的决心。

张怀怡是他父母的爱子。到北京料理后事的张怀怡哥哥担心父母经受不住这一打击，和我们约定在收到他父母的信后，用同学的名义谎称张怀怡外出串联了。

两年后，张怀怡的父母终于知道真相，两个老人伤心欲绝。

林彪机毁人亡，身败名裂后，张怀怡的罪名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同学们都已离校，似乎不再有人记得他短暂的一生。但正如鲁迅先生在纪念被段祺瑞执政府枪杀的刘和珍君时所说：“然而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一九七八年，清华大学党委为张怀怡平反并向其家属发放抚恤金和生活补贴费三百元。

呵呵，三百元，人的生命是如此珍贵！

三十年后，全班同学和从纽约赶来的周启博先生一起举行了一次气氛凝重的追悼会，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

当求死不能时，人在绝望时还可能精神错乱。那是以一种生不如死的方式在生死之间作无限期的徘徊。

文革初期我无意中遇到两个受到迫害或刺激后精神错乱的女学生。她们的遭遇也是值得人们同情和发人深省的。

大约是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前后，北京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的学生王荣芬到清华看大字报后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如果你不是大字报中讲的那么坏，希望和你在颐和园十七孔桥铜牛旁见面一谈。”信中还约定了时间和手持报纸的见面暗号，署名是“同是天涯沦落人，高洛梅”。

我并没有收到这封信，因为八月二十四日红卫兵血洗清华园后，我已逃离北京。（见拙著：《亡命天涯》）

信落到文革期间负责批斗我的两个清华学生手中。在那个“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年代，他们显然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了，因而如获至宝，以为发现了我的反革命活动线索，决定假扮我去和这个“天涯沦落人”见面。

但在约定的时间里，神秘的“天涯沦落人”并没有露面，这两个学生以为受到了我的戏弄。不料，一星期后又来了第二封信。信中说如果我还能相信她的话，请我在新约定的时间和她见面，地点和暗号依旧。为了掌握我的反革命活动证据，两人不顾又一次被戏弄的可能，决定再次前去赴约。

扮演我的是一位矮个学生，另一位高个学生则在远处放哨，以策安全。过了约定的时间，十七孔桥四周却不见人影。此时天色渐暗，下起了毛毛细雨，两人正想离开，只见王荣芬手握报纸从远处匆匆赶来。湖边别无他人，她和冒牌的叶志江很快对上暗号。两人沿着昆明湖边走边聊，王在三个小时的湖边漫步中毫无顾忌地倾吐了她对文革的批判，并为彭真、蒋南翔等人鸣冤叫屈。王还解释她第一次未能赴约，是因为红卫兵抄她的家而无法脱身。

临分手时，矮个学生突然说他不是叶志江，似乎想告以实情。但当王荣芬面露惊讶，责问他为什么骗她时，他又立即慌称他是叶志江派来的。

年仅十九岁的王荣芬哪里能想到人世间的险恶，在颐和园门口，她还生怕这个自称“叶志江派来的人”错过了食堂开饭时间，特意去买了几个面包让他带回清华。

几十年中，我为她的单纯和她的面包惋惜不已。

这一高一矮两个人回校后将王荣芬的“反动言行”整理成揭发材料，连同那几个面包一并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该校文革领导立即将王荣芬看管起来，准备批斗。王乘人不备（又是一个乘人不备，可见文革时期的“群众专政”漏洞百出），怀揣文革资料逃出学校。在喝了几瓶敌敌畏后，她冲进外国驻华大使馆。在被使馆守卫拦下时，她已昏迷不醒。当她苏醒后，人们发现她已精神错乱。在攻击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以外，又给她加了一项更加可怕的叛国投敌罪名。好在她对此已经无所谓了。

我从外地回校后，看到了这两个学生整理的那份揭发材料。除了记述王荣芬的大量“反动言论”外，他们对冒名顶替的情节也写得绘声绘色，让我印象深刻，过目不忘。

惊讶之余，我深为王荣芬的遭遇惋惜，甚至觉得自己也是这一悲剧的肇事者。如果我不畏红卫兵们的追杀留在学校的话，王荣芬也就不会有此遭遇。

在革命的大风浪中，人在生死之间的命运往往会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而发生改变。当洁白的二校门在红卫兵血洗清华园时轰然倒下后，红色恐怖殃及的不仅仅是清华大学数百名教授、干部和学生，连远在魏公村的北外学生王荣芬居然也被它的余波伤及。

一九六八（一九六七？）年的一天，清华冶金系（？）的一个女同学忽然来找我，问我是否认识王荣芬。我很惊讶，便告诉了她上面这个故事。她告诉我王是她的邻居，出事后一直住在公安医院。王的母亲不久前和她说起她女儿口中一直在喊一个叫叶志江的人的名字，可能王发病和这个人有关。当她告诉王荣芬的母亲叶志江是清华的学生后，王的母亲便希望我能到医院去见一见她的女儿，或许可以唤醒她女儿的记忆。

我答应了。但我后来没有再见到冶金系的这位女同学，自然也没有去医院看过王荣芬。

我无法回忆起我未能去医院见她的最终原因，我也不记得冶金系的那个女学生是如何同我失去联系的。或许是王的母亲改变了主意，也或许是后来我毕业离校了。我更怀疑当时我是否因为潜意识地认为王荣芬已成为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而害怕连累，而却步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关于王荣芬日后命运的片字只语。但几十年中，我常为未能主动去寻找她们而内疚。

当黄肖路在网上追问我的人生经历时，我写下了上面这个故事。而她立即给我回了信：“我想你说的王荣芬就是我E—M A I L给你的文章中的王容芬。我简直不能相信你不知道她后来的下落！”

从她附寄的文章中，我才得知王荣芬，如果她和王容芬确是同一个人的话，在服毒自杀前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正气浩然的信，要求尊敬的毛泽东主席“以中国人民的名义想一想：您将把中国引向何处去？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场群众运动，是一个人在用枪杆子运动群众。”

王容芬因此被判了无期徒刑。她在狱中渡过了近十年的铁窗生涯和三年劳改岁月，遭受过非人的折磨。直到一九七九年，她才以反对四人帮的名义被“宣布无罪，立即释放。”

出狱后的王容芬“如狼似虎读史书，补功课，一把年纪出国觅师、写论文，求索人类历史上重大灾难的理论根源……。”终于成为著名的研究韦伯思想的专家，译介了大量德文社会科学

名著，包括马克思·韦伯的《儒教与道教》，还写出了《燧人氏》、《庖牺氏》、《有巢氏》等远古史小说系列。

我十分骇异于黄肖路的回信和王容芬后来的遭遇。多年来萦绕于脑际的疑问和内疚终于得到了释放。我和黄肖路过去并不相识，但在我第一次接到她的电话时却感到了冥冥之中一种神秘的力量，让我生出一种倾吐人生的悲欢离合的冲动。王容芬的出现似乎证实了我的这种预感。

但我将王容芬写成我记忆中的“王荣芬”，我的两位同学写的揭发材料中用的便是这个名字。（王容芬其人其事，请参看本刊 z k 0 9 0 7 b 所载“女政治犯王容芬”（作者：戴晴、洛恪）一文。——编者按）

人对细节的记忆有时是很无奈的，在我的记忆中或许还有其它的不确之处。

人到晚年重温旧梦时，总是奢望能解开人生旅途中那些不解之谜，能带着无憾离开这个世界。我十分希望那个冶金系的女学生能见到我的这段回忆，能填补我记忆中的那些空白。

攻击文化大革命可以导致一个人精神错乱，而积极投身文化大革命亦可能在高度亢奋后导致精神错乱。这就是我的另一个故事的主人公的命运。

我不知道她的真实姓名，文革开始后她改名为吴红兵了。她是北京工业大学的一个老造反派，但因为内部分裂，被另一部份造反派开除出她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她一气之下跑到成都去“立新功”。在一次数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当她代表自己原来的红卫兵组织发言时，有人给大会主席递条子宣布她已被该组织开除。她当即昏了过去，醒来后便精神错乱了。成都的一个红卫兵组织将她送到北京精神病院治疗。而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却认为吴红兵受到了政治迫害，就像苏联的革命者被赫鲁晓夫送到精神病院一样。我的同班同学沈台平在吴红兵发病时曾守护在她的身旁，并因此而被扣押在成都。从成都打来的电话说：为了营救沈台平，需要清华能派人去医院证实吴红兵的确得了精神病。

我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骑车去了安定门外的北京精神病医院。

医院里接待我的是一位年青医生，我向他说明了来意，并要求见吴红兵。

因为我不认识吴红兵，我要求医生能使我相信我见到的是吴红兵本人并确信她有精神病。年青医生想了一下后说他可以办到，但要求我坐在旁边不讲话，因为吴红兵还处于亢奋状态，我的身份可能会刺激病人。

当我坐定后，护士便去将一个女孩子带了进来。只见她一头乱发，声音嘶哑，一双眼睛红肿得像核桃一般大。年青医生问她喉咙怎么哑了，她告诉医生她指挥同病房的病人唱了一夜革命歌曲。年青医生朝我看了一眼，我会意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我已确认这是一个精神病人。

于是，医生又问她：“小吴呀，你叫什么名字？”

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小吴回答说她叫“吴敌”。医生一楞，我也紧张起来。好在医生比较沉着，又不慌不忙地问她：“你怎么改名字了？”小吴回答说：“我要‘无敌’于天下！”

可怜的“无敌于天下”的红卫兵！

有谁能告诉我吴红兵后来的命运？

□ 原载《万象》杂志2009年5月

附：网络上的回音——

唐金鹤：

我就是冶金系去找他的那个女生。我记得，当时，我是求他，希望他能够和我一起去公安医院看看王容芬，救一救王容芬。在我的记忆里，叶志江没有答应和我一起去公安医院看王容芬。所以，这几十年来，当别人对我提起叶志江的任何事情的时候，我多装作没有听见，一言不发，就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人。

叶志江：

我在万象杂志和清华网站上发表《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文的目的，除了叙述那个年代青年学子所经历的苦难外，一个或许纯属个人的原因便是寻找那个“冶金系的女学生”，所以我在文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到晚年重温旧梦时，总是奢望能解开人生旅途中那些不解之谜，能带着无憾离开这个世界。我十分希望那个冶金系的女学生能见到我的这段回忆，能填补我记忆中的那些空白。”

我的许多回忆文章都曾将早已失散的校友唤醒，一起重温旧梦，填补细节，不管它有多么苦涩。我始终相信这位“冶金系的女学生”会看到我的文字，只要她还在人间。

让我意外的是唐金鹤学长，这个我在网上早已熟悉的名字，竟然就是我要寻找的人。我十分高兴并感谢她终于打破沉默，不再对“叶志江的任何事情……”，都装作没听见，一言不发，就当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一个人。”

年轻时读托尔斯泰的《复活》，曾让我在心灵上感受到巨大的震撼。当聂赫留朵夫去监狱探望玛丝洛娃时，他是为他年轻时所犯的那个浪漫错误而忏悔，因为他的浪漫错误，玛丝洛娃沦为妓女，受尽苦难。

或许我当年所犯的错误没有如此罪孽深重，但聂赫留朵夫依旧让我无处遁形。所以，“几十年中，我常为未能主动去寻找她们而内疚。”

我在《徘徊在生死之间》一文中又说：“我无法回忆起我未能去医院见她的最终原因，我也不记得冶金系的那个女学生是如何同我失去联系的。或许是王的母亲改变了主意，也或许是后来我毕业离校了。我更怀疑当时我是否因为潜意识地认为王荣芬已成为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而害怕连累，而却步了。”

读了唐金鹤学长的留言后，当年的一些细节似乎更加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想起我应当和她见过两次面。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曾答应去医院见王荣芬的。文革期间，我对于受难的人都有点“同病相怜”，也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并不太顾及受难者的政治立场。所以我们有了第二次见面，大概是安排具体的探望方式。但在这次见面时，我一定是退却了，不再愿意去医院。在第二次见面前我找了那“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详细询问了王荣芬的情况。他们所说的王已成了“叛国的反革命分子”的话一定吓倒了我。

虽然我“救过美”，但我从来不是一个“英雄”。我有懦弱的一面，譬如文革初期被批斗时我曾害怕和软弱过。我对于文革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决非如王荣芬那样在六六年便有如此深刻的见解。

我和唐学长见面的时间看来不是在一九六八年，但我认为也不太可能在一九六六年。“八二四”后我已逃离清华，十一月才回校，很快我又和其它几个同学去了成都，至十二月底才回来。六七年一月初，我卷入炮打康生的旋涡中。我怀疑唐学长是六七年早春时来找我的，那时我已成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混蛋”，自身难保，这或许也是我当时不愿意自找麻烦的原因。

在我的印象中，唐学长是一个典型的邻家女孩，言词十分温和，和如今活跃在网上的她似乎判若两人。即使我后来表示不能去医院看望王荣芬，她当时也并未因此而责难我。但她以一个局外人，仅仅是邻居和童年的玩伴，义无反顾地为王荣芬奔走，这显然让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惭。读了她的留言我才知道，我的懦弱曾使她对我如此深恶痛绝，这更使我无地自容。

其实，在拒绝了她后，我的内心也从未安宁过。王荣芬躺在病床上呼喊我的名字的情景常常在我脑海中浮现，我猜想她一定是认为我出卖了她，因为去见她的学生曾宣称他“是叶志江派来的”。

数十年过去了，一切都已成了过眼烟云。王容芬甚至难以相信在她昏迷的过程中有过这段插曲，因为“文革伊始家母就成了专政对象，后来更艰难，单位、街道、外院的人都去抄家。很难想像她会参与故事。”

感谢唐学长确认了我的记忆，虽然心灵深处的伤痕将永远提醒自己曾经的懦弱。

我从未原谅过自己。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             |          |
|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             |          |
|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             |          |

---